

“圖書館學辭典”是一部有毒害的書

于 声

最近，商务印書館出版了一部卢冀京編的，刘国鈞和李小緣校的“圖書館學辭典”。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出版这部“巨著”，應該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政治意义。可是，这部“巨著”并不象人們所期望的那样，相反的，竟是一种偷卖资产阶级反动货色的有害的出版物。它不仅有害我国圖書館事业的建設，且还直接伤害全国圖書館界的讀者。

这部“巨著”的錯誤严重，缺点很多，我在这里仅仅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濃厚的资产阶级观点

通过“圖書館學辭典”一書，充分暴露了編者、校者的保守思想，不敢面对现实。从而也就把一些沒落階級的感情，反映得十分明显。这主要是在極大程度上表現編者有“怀古鄙今”的情緒。有人說：“圖書館學辭典”的出版，是“圖書館學大辭典”的繼續补充，不过是增加了些新的花样，但大部分仍然还是旧的貨色。

不少的詞彙，都是根据陈旧書刊的内容来收录的。更难理解的是在迷信外国方面，除了大肆宣傳布郎、杜威、克特等等的资产阶级分类法外，还为布郎、杜威、克特之流作了較詳細的傳記。

編者在解釋“总集”的詞条里（416頁）引証了梁蕭統的文选，說成是我国留傳最古的“总集”。但为什么編者就不能在“选集”的詞条內举出“毛澤东选集”为例来作說明呢？

編者对陈旧的、将要消失的东西，維護得无微不至，而对新生的事物，則避而不談。如書內編列的“圖書館保障率”、“圖書館流通率”、“圖書館統計”等詞条，都是陈詞濫調，解釋欠妥，沒有科学的根据。而对社会主义苏联圖書館从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圖書館統計与圖書館各种工作的服务指标”，則不收編，也不加以引用（參見“文化統計”。苏联波格达諾夫著。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統計学原理教研室譯）。

又如，編者在“檢字法”詞条下，罗列了104种檢字法，像王云五、林語堂、陈立夫等反动派的檢字法，均被收录无遺，而对当前我国汉字改革、新文

字拼音及音序檢字法，則都摒棄在書外。

此外，还把封建时代藏書家的格言，如郑樵的“八求”，孙从添的“六难”等等，大加註釋。从而也就看出本書唯一的特点，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东西，无不大大加鼓吹，在全書中占居主要的位置，但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的一切事物，則極为鄙視、漠視而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編者在全書最后很特殊的附加了苏联哲学家凱德洛夫的“論科学分类”一文。編者在文末加上按語說：“按上文所述系科学分类的关键問題，但馬列主义世界觀以及毛主席关于知識分类學說，其本身均非直接指圖書分类而言，圖書分类，仍应联系圖書的实际”。

請問編者，圖書的实际到底是什么？科学分类难道就不是圖書分类的根据嗎？

編者按語的实际意圖，是想通过这篇論文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分类法，反对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观点为基础的新分类法，这种掩耳盗鈴、混淆是非的用意和手法确是十分恶毒的！

(二)选材、編排上的大量缺点

在取材范围方面，編者詳細地蒐罗了古今中外的一些陈詞濫套，同时又拼凑了一些新的材料，不加选择，編在一起。除詳尽无遺地录用了杜定友の“圖書館表格与用品”，刘国鈞的“圖書館學要旨”，馬宗荣的“現代圖書館經營論”，以及大部分来源于“圖書館學季刊”等的旧資料外，对1956年以前出版的一些有关圖書館學方面的資料，遺漏处仍然很多。虽然如此，在編者看来，这样的拼凑办法，似乎已使辭典内容足够丰富了。但一本著作内容的丰富与否，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多少，而主要决定于它的質量如何。

如果把大量的陈旧資料作为社会主义新圖書館的参考資料，它只能有害于我国的圖書館事业，而不能給予任何一点好处。

同时，編者还在“辭典”內收录了一些与圖書館學无直接关系的詞彙，如：“一覽表”、“公文”、“日

曆”、“入門証”、“工作程序單”、“專利”等等，并在註釋這些詞條時也沒有半點涉及到圖書館學。使得讀者看了這些詞條覺得“莫名其妙”。

在本書的編排方面，編者沿用了“圖書館學大辭典”筆畫字順的老辦法。這樣作的結果，就把同類同性質的一些問題分散在各處，如把50多種分類法分散于全書，顯得每種分類法似乎同樣都有參考的價值。這樣，就會使得主要的和次要的沒有區別，先進的和落后的混為一談。于是就蒙混了讀者的視線，而使讀者在五花八門的分類法面前無所適從。

在編排上還有其它不少的缺點：名詞術語不一致，簡體字與繁體字沒有說明，字里行間錯字還多。如“王德干新檢字法”（47頁）及“王德乾新檢字法”（538頁）等；“文武邊”見“邊欄”條。究竟“邊欄”條編排在書內何處，還無法查出。

（三）註解、譯名上的嚴重錯誤

編者在詞條的解釋上，絕大部分是片面或錯誤的。現舉例說明如下：

1.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毛主席著作編目法”（500頁）。編者沒有把它列在顯要的地位，只是用了一般圖書著錄的辦法來作說明。而在說明內還有不妥的成份。圖書館是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思想陣地。圖書館員又是黨的宣傳員。那麼，為什麼就不把這些經典著作的編目法在“圖書館學辭典”內加以突出的說明呢？這不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嗎？

2. “中國圖書館事業”（130頁）詞條本身和註釋都有很大的缺點。既然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就應該將新舊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加以比較的說明，并在敘述舊中國圖書館的工作時進行必要的批判。但是在這一詞條里對於解放前圖書館事業及其工作倒列述了很多，而對解放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一般工作情況只作了片面的草草的介紹。這種輕重倒置，主次不分的做法，給予讀者是什麼樣的影響呢？對讀者起了什麼樣的教育作用呢？

我們不能否認解放前圖書館工作的每一成就，但我們也不能忽視解放前圖書館事業主要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本質。它和新中国圖書館事業有着本質上的區別。而編者却假痴假呆地抹煞了這一區別。這又是多么嚴重的錯誤！

3. “為讀者服務”（46頁）。編者是完全依照

杜定友先生在1954年為商務印刷所圖書館用品部而寫的“圖書館參考資料”（三）一書的內容來解釋這個詞條的。

杜先生為讀者服務的理論觀點是極端反動的。他否定了圖書館工作的階級性。他以超階級的面孔來對待圖書館工作。在他1951年3月出版的“新圖書館手冊”內，首先提出的是：“圖書館為人民服務，不分階級，一視同仁。圖書館為人類保存文獻，對於圖書，不論新舊，一律選存”。從這一段話的意義中，就可以探索出杜先生的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來。

編者放棄許多正確解釋為讀者服務的意義的資料不用，而錯誤地獨獨選用杜先生的反動說法，可見他是有意識地在宣揚資產階級的觀點。

4. “舊書”（181頁）。把內容陳舊、毫無閱讀價值的書籍，解釋為“擱置經久，無人閱讀的書為舊書。”這是一種何等可笑的解釋呀！

5. “毛邊”（137頁）。毛邊紙的稱謂，本來是由江南藏書家與刻書家的毛管而來的。當時毛氏曾把印書紙分為“太”字與“邊”字兩號，直到現在仍沿用着這一名稱。而編者在詞條內解釋為“手工製造，未經裁邊的，稱之毛邊紙”。還附加了一句：書頁之有毛邊的通稱“毛裝本”，這種解釋又是何等的荒謬！

6. “專論”。把單行本、小冊子稱為“專論”。是否單行本和小冊子都是專論呢？這實在是一個幼稚的看法！

在譯名方面也有很多的錯誤或不妥之處。例如：把 Адресная книга “住址簿”譯作“指南”；把 Без всяких данных о выходе “無出版方面的任何記載”譯作“出版項”；Библиотечная сеть “圖書館網”譯作“圖書館制度”；把 выдача книг за год “一年內的圖書出借”譯作“圖書流通率”……類似的錯誤和譯意不明不妥的地方，據初略的統計僅在俄文方面就已達100多個。至於其他外文譯名也有不少錯誤或歪曲，例如把 Card catalog (ue) cabinet “目錄櫃”和 card catalog (ue) tray “目錄屜”混為一談；把 title piece “小飾圖”譯成“書簽”；把 analysis of periodicals “期刊論文的分析”譯成“期刊論文”；把 union accession list “總登記簿”譯成“總括登錄”等等。

為了節省篇幅，這裡只列舉了極少數的例子。單從這些例子就已不难看出“辭典”中的錯誤程度。